

[旧版文章](#)[天人古今](#)[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先秦史论](#)[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汉唐史论](#)[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史论](#)[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明清史论](#)[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近代史论](#)[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现代史论](#)[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学科春秋](#)[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理论方法](#)[史观史法](#)[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动态信息 / 研究动向 /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十二届年会论文摘要 \(二\)](#)

###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十二届年会论文摘要 (二)

2006-10-10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点击: 1372

#### 社会

###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十二届年会论文摘要 (二)

时间: 2006-9-16 15:26:48 来源: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 本站 阅读688次

#### 三、社会

##### 北宋宰辅的出身与入仕途径分析

陈国灿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北宋时期的宰辅,就家庭背景而言,总体上可分为官宦之家、富裕之家和贫寒之家三大类。出身官宦之家的宰辅在北宋历朝宰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具体又可分为父为前朝中央官员、父为本朝中央官员、祖上曾为中央官员、出身地方官员家庭、有亲属为官五种情况。其中有不少父子、祖孙、兄弟等先后入朝执政的宰辅世家。出身富裕之家的宰辅有相当部分也来自官宦之家,出身富裕平民之家的宰辅数量不多。来自贫寒之家的宰辅为数不少,较富裕家庭出身的宰辅明显要多。

虽然北宋选拔官员的途径包括科举取士、学校考选、门荫恩补、流外、进纳、军功、在职官员推荐等,但宰辅大多经由科举入仕。即便最初由其他途径入仕,也往往要参加科举,获取进士身份。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北宋,先后有宰相72人(几次登相位者按1人计),进士出身者为63人,占总数的87.5%。

北宋宰辅出身和入仕途径的上述特点,是与宋廷实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和完善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它既反映了官僚队伍的来源趋于广泛和多样化,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和方式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官僚队伍的派系之争由以往地望家族集团间的冲突转变为不同政见集团间的利益分歧。

#####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地位

——兼论天水一朝造就的士人精神

舒仁辉 温瀛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民族英雄文天祥最好地反映了宋代文明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社会价值。在南宋王朝不复存在的背景下,文天祥不愿为元朝所用而英勇就义,既有坚定的个人信念,也是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政治主体意识的自然表现。从杨家将到文天祥,宋代出现众多精忠报国的典型,反映出宋代实行文明政治所取得的明显社会效果。宋代长期坚持崇文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提倡科举,给予士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越的生活待遇,读书人不论门第高低都能凭才学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因而士人多感激国家的知遇之恩,负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文天祥的背后有很深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受到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更受到当地先贤的形象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状元、宰相,特别珍惜国家赋予的荣誉,承担报答国家的义务。他所体现的士之精神更鲜明、更全面,更有代表意义。因此,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更具有社会意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之形象，被后世政权树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选择更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浩然正气，逐渐成为以士人为主流的全民人生价值标准；其勇敢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坚决抵抗外来侵略。

### 宋朝的“乡举里选”

吴铮强 浙江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宋朝的科举改革中，“三舍法”等学校取士政策是以“乡举里选”名义展开的，但这种政策与“乡举里选”的本意背道而驰。围绕着加强或限制皇权的问题，宋廷形成了反对或要求“乡举里选”两种意见。苏轼看透专制政权的实质，认为权力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科举制度与此适应，“乡举里选”断不能行。但同时也有不少士人试图推动科举制度向真正意义上的“乡举里选”靠拢，这其实是地方社会要求限制皇权的一种呼声。宋人对宋代不能实行“乡举里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吕祖谦则认为其根本原因是错把学校看作一个“官司”，这种观点十分深刻。而朱熹从学校取士的现实弊端中，提出了学校教育与科举分途的观点，要求将理学思想纳入到科举考试的内容当中去。从“乡举里选”的论争到“科举理学化”方案的提出，是宋代君主专制背景下士人争取政治权力的一种努力，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博弈的一种结果。

#### 宋初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

何冠环 香港理工大学 五代至宋初的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符氏将门，自后唐的符存审起家，到其子符彦卿封王建藩，五代时期之大半，符氏不仅是声名显赫的将门，遗因后周世宗先后娶符彦卿两女为后，又拥有外戚身份。入宋后，在宋太祖一朝，以前朝外戚及强藩之嫌，符氏多数时间为太祖所忌而不获重用。然而，被太祖培养为继承人的皇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在后周世宗时娶符彦卿第六女为妻，故符氏又拥有『准外戚』的身份。虽然符皇后在太宗即位前一年已死，但并不妨碍符氏在太宗朝恢复为戚里之家。太宗除重用藩邸旧臣外。也比太祖更喜用外戚武将统军作战。在太宗、真宗两朝，符彦卿两子、第三代的符昭愿和符昭寿都颇受重用，先后领军出战和镇守大藩。但其才具有限，并未建立功勋、重振家声。仁宗朝以后，符氏除第五代的符惟忠外，再未见出色人物，这个在五代至宋初一度显赫的外戚将门，走上衰落之路。关于宛丘符氏的事迹，杨果教授早在1992年即为符彦卿写过一篇深入浅出的传记。另外，研究家族历史的学者也注意到陈州符氏这个名门。2005年胡坤教授发表了以符彦卿与周世宗及宋太祖朝政治为核心课题的专论(符氏家族与宋初政治)。本文即在杨文及胡文的研究基础上，参考其它史籍有关记载，考论宛丘符氏将门在整个北宋的事迹。

####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徐红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开始与其家世发生脱离。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的情况似乎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已与魏晋之时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完全不同，家世背景更多的是为他们的后代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和人际环境。本文所论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人数不仅大大减少，而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反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科举考试中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官僚阶层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他们的家庭均十分重视文翰，并注重对子弟的文化教育；同时，他们的祖、父一般均有一定的官职，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势必也会渗透到子孙后代的日常教育中，这些均使他们在以后的宦宦生涯中受益非浅，并使他们成为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群人。

#### 宋代的祈吉巫术及其表现形式

范荧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民间巫术在其传承、演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特点是，原始巫术与原始崇拜的互相渗透与结合，祈禳性巫术即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祈吉以避凶，攘灾以趋吉，本是同类巫术的两个方面，但宋代以来，以祈求吉祥为目的的巫术活动在民间尤为盛行，以至成为城乡中最常见的民俗事象之一。两宋时期，除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及一些封闭的乡村仍有攻击、毒害他人的“黑巫术”外，大部分地区更流行为自己和

家人祈求吉祥的“白巫术”，民间巫术的这一变化，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其一，为加强集权统治，朝廷屡下禁巫令，从而对群体性、攻击性的巫术活动起了一定抑制作用。其二，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士人阶层和城镇居民对巫术行为中极端愚昧、荒诞的部分多持排斥态度。其三，佛、道二教的深入民间，遂使其崇拜仪式对巫术的施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显著变化，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美满逐渐成为民俗心理的主流，这对巫术活动的演化方向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宋代祈吉巫术的施行方式多种多样，其基本特点是散在地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和人生仪礼的诸多环节之中。除以祈求、祷告的形式求取“吉祥”之外，民间还盛行使用吉祥语和吉祥物，期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后世的传承中，人们习以“民俗”来看待，而淡忘其原初之本意，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交感巫术”原理和语言、文字、灵物崇拜的含义。

### 浅析宋代家训的和谐因子

宋东侠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传统家训在调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以袁采《袁氏世范》、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温公家范》、刘清之《戒子通录》、朱熹《朱子家训》等为例，重点分析宋代家训在协调“六亲”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和谐因素。

1、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长少有序。即如朱熹言“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父子是家庭中的纵向关系，是传统社会中保持家族延续、发展的重要纽带。因而子辈须绝对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但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否则，父不慈则子可能不孝，于己于家均不利。同时，朱熹《家训》还强调“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诚情愿地付出。2、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相敬如宾。“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第一组横向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

3、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僖僖。“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兄不友则弟不恭”。兄弟是在夫妻关系中衍生而来的第二组横向关系。宋代家训很强调兄友弟恭的伦理原则，认为兄弟不和，不利于家族的兴旺发达。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基。

### 张栻后代考析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

张栻的后嗣在专制时代就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关注的问题。然因宋末局势的动荡和文献记载的分歧，张栻的后嗣在当时就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加上明清张姓家族对张栻的追宗认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混乱。民国《绵竹县志》编修者作《紫岩张氏》谱系表，对此进行梳理，但疏谬众多。今人论著虽有涉及，但未曾对历史文献、方志谱牒矛盾而混乱的记载加以辨析。本文通过对张栻后嗣的梳理和考析，认为历史文献中关于“有后”、“无后”的记载都有其事实依据。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和杨万里《张左司传》关于张栻“绝嗣”的记载，盖指张栻没有嫡传子嗣，并非无后人：《宋史》之《度宗纪》和《文天祥》关于张栻“有后”的记载，盖指犹子焕、炳等，并非亲生嫡传；清代多种《张氏家谱》关于张栻“后代”的排列，盖追宗认祖所致，不足为信。

### 宋末元初吴兴士人社会初探

近藤一成早稻田大学

宋代，以州为单位实行科举的初次考试一解试。这是这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由于礼部试以上并不按地域选拔合格者，因而造成了最终科举合格者的地区差异。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江南，虽然在宋代之后文人学者辈出，被称为文化荟萃之处，但是在宋代，总的说来科举合格的人数并不多。

考察科举的地区特点，如果不关注科举合格者的绝对数量，而是关注不同时期科举合格人数的变化，那么南宋时期，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浙东·

浙西),以及福建两路诸州的科举人数变化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递增、持平、递减。其中,递增的典型是沿海地区的明州和温州;递减的典型是江南地区的常州和湖州。前者被认为是东南地区中相较而言新开发的前沿地区,后者则被认为是已开发的发达地区。由此可推断,科举合格人数的这两种变化趋势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南宋时代,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合格人数日益减少的原因何在?由此又产生了怎样的地域特点?本文将以南宋时的湖州为例,探讨这些问题。

南宋末至元初,身为宋朝宗室却在元朝为臣的元代表性文人·政治家赵孟頫,以及出生于宋朝下级官员家庭、自身却以宋朝遗臣自居的“爱国词人”周密,两者都是湖州人。两人虽境况迥异,但终其一生都交往频繁。本文将从湖州的地域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贰臣”与“忠臣”间的交往情况。

### 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

喻学忠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士风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是晚宋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多种表现,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士人,都表现出奢靡的风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形成奢靡之风的主要原因有:皇帝生活奢靡,形成诱导之势;皇帝对士大夫奢靡的纵容;政治腐败促进了奢靡之风;士大夫道德沦丧。最后阐明奢靡之风对晚宋政局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危害:助长了晚宋政治腐败;毒害了整个社会风气;造成晚宋士大夫不能倚仗:加剧晚宋的经济危机。

### 宋代家庭中的奩产纠纷—以母亲为中心

高楠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宋代社会中,大多数母亲独立掌控自己的奩产,她们生前对奩产的处置一般不会引发家庭矛盾。母亲去世后,其奩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家庭成员常常因奩产的分配而涉讼,姻亲之间也有为此对簿公堂者。与以往判案相比,因当事人关系多元化,案情情节的复杂化,且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为依据,故执法过程中更易渗入个人情感,其判决更具随意性和灵活性,突显出天理、国法、人情综合运用特征。

### 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与宋代社会的变迁

韩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无论从发生频率、时空分布,或者疫病种类、社会反应层面,都有一种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显示出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在疫病的认识 and 应对方面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活力。那么,宋代疫病的时空分布、发生频率如何?它的时间和地域布局是否与宋代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两宋都城消防问题研究

陈欣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宋代经济与文化处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项盛时期,其城市管理制度也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对全社会恶性火灾连绵发生、后果严重的具体情况,统治阶层开始思索一整套完备的防火、灭火体系。本文试从宋代都城所发生的大型火灾案例出发,对导致城市频繁灾情的原因作初步探索归纳,同时也阐述了宋朝的防火制度及其对后世消防工作的影响。

### 以道自任,社稷为重

——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述论

郭学信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天祥之所以能被列为仁人志士的伟人之列,乃是由于其叙事本体充满了以“正气未亡人未息”为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一、法天不息,自强兴国。这是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最具特色的内容。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天地与道同一不息”为中心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正是从自强不息这个宇宙的根本法则出发,文天祥针对南宋理宗朝的弊政,提出了改革不息、自强兴国的理论。

二、“以人民社稷为重”。文天祥在继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的认识,提出了“以人民社稷为重”的思想,把人民

和社稷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爱民与爱国是统一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决不能只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而不追求外在事功；圣贤应以心忧天下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人民。

三、成仁取义，崇尚气节。文天祥承继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正气精神，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就是在正气战胜邪气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法则表现于自然、社会中是如此，体现在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身上亦是如此，所以他指出，具有正气品格者，就会“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文天祥在抗元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斗争不息精神和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 《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摘要

刘道平重庆市合川钓鱼城管理处

本书2006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宋蒙(元)钓鱼城之战的历史背景、36年抗战经过，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人物评价，并从多角度、多层面详尽地记述了钓鱼城古战场的历史遗存、景观特色、保护开发建设成就以及学术研究、旅游发展等内容。全书共分八章，在第一章中突出了钓鱼台、钓鱼山与钓鱼城的唯一性；在第二章中突出了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并在大事年表中，综合各家史料，正确记述了所发生的事件和年代，纠正了有的出版物中把公元1231年西和州(甘肃和县)发生的事，拉扯到四川合州等诸多史实错误。对钓鱼城36年抗战，首次划分为四个时期；在第四章中对钓鱼城古战场的摩崖石刻及碑记，首次作了准确全录介绍；在第五章中，从全新的角度，记述了钓鱼城的保护、规划、开发建设与管理，特别是保护开发建设大事记，是翔实独有的文献资料；第六章钓鱼城的历史研究与著述，也是迄今为止首次作了全面介绍；第七章钓鱼城的诗词、楹联集录，就作者见闻所及，首次作了全录介绍，可谓广博丰富；第八章记述名人与钓鱼城、钓鱼城的旅游发展概况及未来展望等。全书约30万字，有历史景观图片200余幅，附有古今人名索引1190余人。图文并茂，资料详实，是迄今为止，最为丰富、准确、完整的一部钓鱼城历史读物。

#### 关于廉洁学术风气的刍议

那楚格民盟一. 所谓廉洁的学术风气。一般来讲，“廉洁”是一个社会所提倡和认可的行为，而廉洁的学术风气由是指学术界在其社会活动中，遵守公认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群体中逐渐被认同的以廉洁为导向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二. 廉洁的学术风气之社会功能。1. 有利于拒腐倡廉观念的形成；2. 有利于社会监督；3. 有利于遏制学术腐败蔓延。三. 加强廉洁的学术风气建设。力戒学术权力化、学术市场化(商品化)倾向。

#### 宋代峒丁的组织与运用

刘馨珺 台湾嘉义大学史地学系

〔峒丁〕在《宋史》中，是指广西左、右两江，邕、钦两州的溪洞乡兵。就广义而言，本文认为峒丁是由西南溪蛮少数民族构成的地方武力，主要分布于湖南、湖北及广西一带。宋朝对诸蛮的管理政策，从基层衙门开发控制地方的程度，概分为生、熟二类，其中生蛮是距离州县堡垒较远，且不属王化者，所居之地称为『生界』，而缴纳赋役的州县百姓是为『省民』，在生界与内地之间，则杂居着熟户、山徭与峒丁。北宋以来，官方逐渐加强对峒丁的教阅训练，迄蒙古南侵时，南宋遗曾运用大批的峒丁对抗蒙军。

宋朝将徭洞的归附者称为归明人，为了有效控制少数民族的社会，除了建置州县、征收赋役与订定管束法规外，还有两项政策，一是封赐溪峒酋长归明官职，二是组织峒丁成为可用的乡兵。自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后，地方官团结聚集峒丁数量达十余万以上，峒丁的管理法条增多，相关问题也随之浮现。

本文以『峒丁』为研究核心，问题焦点是：一、厘清峒丁的定义。二、峒丁的来源，包括峒酋的出身及峒丁的分布。三、峒丁的训练教阅、赏罚与管理。四、峒丁的功迹，包括两宋峒丁在抵御交趾、平乱、勤王和抗蒙的战绩，以及支持修建城池和军需运补等工作。藉由探讨『峒丁』的过程中，更清楚宋代边区的地域扩展与社会活动，并思考宋代官方对于特殊地区的控制能力。

#### 蒙元时期汉人世侯文化素质之探讨

蒙元时期以史天泽、张柔、董氏兄弟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其初兴之时，在其综合素质中，武人特质最为明显，这种特质当然非常有利于他们在金末剧烈的动荡环境中攻城掠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蒙古统治者开初也正是看到了他们这股可以利用的武力；但是对于当时急需保护的汉文化而言，和蒙古贵族最为接近的汉人世侯，如果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自身的对汉文化危机的认识没有一种行将灭亡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劝说蒙古贵族保护汉文化。

汉人世侯通过和北方儒士们的长时期的频频接触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其文化素质较之初兴时期逐渐提高，增添了一些士大夫独有的文化气息，有的喜欢文学、史学、医学和艺术，有的能说国语(蒙古语)，有的喜欢藏书，有的资助儒士们出书，不再仅仅是一介武夫，这种综合素质的变化，将使他们在战争中，更少地受蒙古族军人滥杀之风的影响，更多地重视人的生命和文化的保护，从而也更有利于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向蒙古权贵宣仁“汉法”的优越性所在。以前蒙古史学界多未对此问题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番分析，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人。

### 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

程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谓“一般士大夫虽亦家有伎妾，已不若前代远甚，从正史及笔记来看，宋诸名臣蓄妾并非个别现象。从司马光为亡妻所作传看，则无论儿是否庶出，司马光家中的确蓄有妾室。在以女性为墓主的墓志铭中，女主人的“不嫉妒”“善待妾媵”，更作为士人贤妻的重要善迹，往往见于文字。这类的记事一般不见于男性的墓志铭，这当然和女性的角色有关，而也间接说明，妻妾之矛盾正是家庭的主要矛盾，如何待妾也就成为衡量妻“贤”与否之标准。而尤为男性士人所称道的贤妻，更不惜拿出自己的奁产来主动为丈夫纳妾。有些士人仕途未必亨达，家业未必富有，却也妻妾双全。这类家庭子女数都不多，看来蓄妾主要为了生子续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家庭夫妻都很年轻，而家中已有妾的存在，甚至有先纳妾再娶妻者。有些墓志铭虽未明载其家媵妾的存在，但不少墓主子女成群，而且其年龄相差很大，不少近于两代人，笔者仅根据文集数种，即找到不少多子女家庭，这样的家庭很可能是妻妾并存的。

### 宋代城镇雇工分布的主要行业述略

刘树友渭南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传播系

宋代雇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曾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本文立足城镇的生产、商业、生活服务及文化教育四大行业，着力探讨了宋代城镇主要行业雇工的形态。

### 金世宗、章宗时期政风士风刍议

关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金朝的社会风气实际在号称盛世的世宗、章宗时期已趋败坏。民风自不待言。就政风而言，当时相对仁厚，但也有苛刻的一面。其次崇礼教，重文治，重儒贱吏。世宗时选官以德才兼备为标准，用人重德行成为一时风气，且吏治尚严。而铨选循资守格，官员多墨守成规，不思上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举贤、不直言，依违苟且成风。章宗时，“廉升”与荐举制逐渐导致官场的奔竞之风。奔竞之风又助长苟且之风。世宗注意遏制女真贵族的骄横之风，章宗则采取纵容态度。世宗章宗时士大夫逐渐从熙宗党狱、海陵王虐杀的阴影振作起来，不少士大夫遂以天下为己任，尚气节，敢言敢为。世宗时学风、士风相对淳厚，章宗时学风文风渐趋衰陋，士风有失醇正。章宗时士大夫甄别君子、小人之风成为打击朋党的诱因。而党狱对士风的消极影响很大。

###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刊刻、流传考

曹刚华东师大历史系

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甚广，地方寺院、私人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搜集史料，从刊行方式和流传范围考察，以进一步了解《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流传的情况。

## 宋代“富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

林文勋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唐宋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财富力量崛起。随之而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这个阶层，既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又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有别于汉唐时期的“豪门士族”。“富民”阶层一经崛起，迅速成为社会的中间层和稳定层，它极大地推动了契约租佃关系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发展推动力，并引起了国家乡村控制方式的变化与调整，从而使唐宋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促成了唐宋以来“富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中唐以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富民社会”。

### 宋代城郭的坊区制度

包伟民浙江大学

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居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性，国家也必然会制订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时有进步，其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学界早已关注此一论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开创性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传统封闭性的坊制崩溃的论点。此后，除有不少中外学者在各自关于唐宋城市的论著中涉及这一论题，更有学者专文探讨，代表性的有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等。尽管如此，由于史料发掘不足以及文献解读差异等原因，关于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讨论还存在不少空间，可供发挥。故草成此文，分坊役、坊额、郊坊、别称四部分，略述己见。结论以为，坊作为城郭基层行政管理单位，迄南宋末年未改。

责任编辑: eoadmin

[文化1](#) >

--文章内容列表--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